

做人做事做学问

洛雨祥题

名家系列讲座精萃

第一卷

邢学亮 陈莉霞

主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做人做事做学问

洛甫祥题

名家系列讲座精萃

第一卷

邢学亮 陈莉霞 主编
吴锡存 张芝萍 副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由部分两院院士、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及某一领域的知名人士的演讲、讲座记录稿汇集而成。这些名人名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对自身的成长经历、社会体验和知识积累的讲述,与大学生进行心灵对话,告诉和引导大学生及青年朋友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人 做事 做学问/邢学亮, 陈莉霞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3-017147-0

I. 做… II. ①邢… ②陈… III. 人生哲学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6376 号

责任编辑: 李振格 沈力匀 陈晓萍/责任校对: 耿耘

责任印制: 吕春珉/封面设计: 东方人华平面设计部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6月第 1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0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7 1/2 插页 3
印数: 1—2 550 字数: 499 000

定价: 60.00 元 (共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2001年2月19日，在严陆光院士倡导下开始举办“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作题为“漫谈青年科学家的成长”的讲座



同学们争先恐后要求著名导演冯小宁签名



“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组委会成员

為寧波大學、做人做事
做學問、名家系列講座題

立志 博學 勤思 求實 修身

甲申年秋 韓啟德

编写委员会

※ ※ ※

顾问：严陆光 程 刚 聂秋华

主任：邢学亮

副主任：陈莉霞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邢学亮 刘 纓 严建雯 吴锡存

张芝萍 张真柱 陈莉霞 胡 敏

秘书组组长：吴锡存

秘书组成员：麻富游 王立衡 曾辛键

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大学时代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同学们在此期间成长成熟，学着各种不同的专业，有着不同的志向，共同的是都应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为今后攀登高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奠定基础。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从事科技工作，在担任了十多年所长工作后，1999年又受命来宁波大学担任了一届校长，从学习前人经验与自身工作体会中逐渐认识到，办好大学应该提倡：第一，领导与管理干部要努力当好后勤部长。第二，教授应成为最受尊重的群体。第三，学生都要努力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2001年初，学校决定举办“做人 做事 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请一些有成就的人士，从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出发，和同学们说说自己的人生感悟，期望对同学们的成长、成熟会有帮助。党委副书记邢学亮同志花了很大精力，宣传部、校长办公室、学生处与团委等部门积极推动，使整个活动受到广大同学欢迎，一千人的礼堂几乎场场满座。至今已进行了60多次讲座，其中有30多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是（按报告先后



次序): 严陆光、何祚庥、郝柏林、刘颂豪、沈文庆、戴汝为、薛永祺、李国杰、师昌绪、杨叔子、丁福熹、邹世昌、郑哲敏、韩德馨、欧阳自远、涂光炽、洪国藩、徐光宪、贺贤土、韩启德、李德仁、韩祯祥、张恭庆、谷超豪、胡和生、方守贤、甘子钊、徐至展, 各界知名人士曹星、冯小宁、梁晓声、赵文瑄、许还山、李佩、陈守义、魏纪中、孙穗芳、林崇德、张平、柏耀平、陈钢、方同光、刘梦溪、王祖皆等, 以及学校老领导朱兆祥、朱自强、吴心平、张永祥、贺建时、裘克安等。大家讲话都没有讲稿, 为了使没有机会亲自听讲座的同学们也能有所收益, 我们根据录音, 整理成文, 承蒙各位名人亲自审阅定稿, 在校内于 2003 年 5 月和 2003 年 11 月先后印发了讲座文集第一卷及第二卷, 各 5000 册, 包括前二十四讲的内容, 受到了广大同学普遍的欢迎。

在此书出版之际, 十分感谢科学出版社的同志们承担陆续出版此文集的工作, 它可使全国广大青年能共享这些名家的教益。同时, 我们也要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院士为此书亲自题写了书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也亲自为本书题词。我们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对大家的成长成熟有所帮助。

几年来, 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 即应该提倡: “做人贵在清白; 做事必须认真; 做学问要: 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希望能与全体读者共勉。

严陆光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像父亲一样做人、做事、做学问·····	严陆光 (1)
在困难中前进·····	朱兆祥 (13)
保持最真实的自我·····	陈帆红 (24)
与电影之缘：真情的流露 热情的燃烧·····	冯小宁 (40)
顺乎历史潮流 坚持个人奋斗·····	郝柏林 (58)
做一个为社会加分数的人·····	刘颂豪 (73)
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做学问要敢于 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严陆光 (86)
努力学习 潜心研究 大胆创新 坚持诚信·····	沈文庆 (103)
文学 电影 人生·····	梁晓声 (122)
传统道德与诚信社会·····	陈守义 (143)
钱学森的故事·····	戴汝为 (153)
科技创新需要高素质人才·····	薛永祺 (167)
理想伴随事业而实现·····	史定海 (174)

像父亲一样做人、做事、做学问



严陆光 1935年7月生于北京，原籍浙江东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电工学家。

1953年至1954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1959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任研究员、所长。长期从事近代科学实验所需的特种装备的研制和电工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曾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并在多个学术机构任职。1999年10月至2004年5月，任宁波大学校长，现为宁波大学名誉校长。

我到学校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很遗憾没有太多的机会和同学们接触。记得去年冬天参加学校的学代会，就有几个同学向我建议，最好能和他们多聊聊天。我想，这个建议是对的。后来，我就一直在考虑怎么聊，聊什么。大概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汤于翰先生到学校来。汤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非常支持我校医学院的建设。他夫人陈云裳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电影皇后。他俩是一起来的，我陪他们到医学院。在规模不大的会上，汤先生做了二十几分钟的即兴讲话，虽然只有二十几分钟，但讲得非常好，就是讲他自己80多年来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些体会。听后，我觉得以“做人 做事 做学问”为主题，和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做个交流，应该是个不错的想法。

回到北京以后，中央决定为我父亲严济慈搞个百年诞辰纪念

【1】



会。父亲 1900 年腊月初四出生，1996 年去世，到 2000 年 12 月 29 日正好 100 岁。中央通知我们，希望我们在会上发个言，并写些文章。我们兄弟几个就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有 7000 字，文章为《继承和发扬父亲做学问、做事与做人的高尚品德》。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我们就决定送往各家报社，文章相继在《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人民政协报》和《金华日报》全文登载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也摘要刊登了。后来，《宁波日报》、《宁波大学报》登了我们在会上的发言稿。《科学时报》登载的时候，把“做学问、做事、做人”的题目修改为“做人、做事、做学问”。我想想也对，因为“做学问”是服从于“做事”和“做人”的，从重要程度上来讲，首先是“做人”，第二是“做事”，最后才是“做学问”。所以，我想就这个题目与同学们聊聊天。

今天我主要讲老父亲。父亲 1900 年出生，1996 年逝世，几乎是 20 世纪的同龄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 21 世纪，新世纪的创造主要靠你们年轻人。但 20 世纪有些好的东西，能够继承发扬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年代相差很远，我想大家不一定都十分清楚那时的情况。我简单地说说我父亲的经历。父亲 1900 年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下湖严村，一个相当贫穷的农民家庭。我的祖父开了个中药铺，父亲有四五个兄弟姐妹，但只有他从小受过教育。1918 年从东阳中学毕业，考到了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后来成为东南大学。1923 年，他从该校毕业，得到老师的帮助及家里的支持赴法国留学，1923 年到 1927 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拿到了博士学位。可以想像，在当时能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父亲毕业后回国，当了一年教授，同时在上海的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等四所高校教物理和数学。1928 年底又到法国做研究，一直到 1930 年年底回国。从 1930 年年底回国到 1949 年，父亲就一直在北京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担任了将近 20 年的所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一直在由 1949 年前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合

并而成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过很多职务。1949年到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所所长；1952年到1954年任东北分院的院长，在那里筹建了若干个研究所；1955年到1981年担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1978年到1981年担任副院长；1981年到1992年担任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以后担任名誉主席。除此以外，父亲在科学院工作的时候，还担任过《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两个杂志的主编，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期刊。另外，从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到1996年父亲去世这段时间，他同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年近60岁又满腔热情地重回讲台教物理课。1961年到1980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80年到1984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1984年到1996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名誉校长。可以说，父亲在科学院工作的同时，又参与创办了一所学校，这就是中国科技大学。学校开始是办在北京，后来搬到了合肥。父亲到老年以后，从1983年到1993年担任过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他是第一个担任副委员长的自然科学家，第一个担任副委员长的社会科学家是郭老（郭沫若）。另外，父亲在1949年以前参加了九三学社，在九三学社担任过各种各样的领导职务。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这么一个人，活了将近100岁，干了这么些事，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便于大家理解发生在他身上各种各样的事情。

下面，我就跟同学们讲讲我父亲是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我还是按照我们兄弟几个写的文章的顺序，先讲“做学问”，然后讲“做事”，最后讲“做人”。为什么要选这个顺序来讲呢？我父亲这一辈子，我们要纪念他、怀念他，究竟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纪念？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种结构比较好：即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把这三个方面串在一块儿，才能够比较完整地描绘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传统，以及哪些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单讲其中一个方面就不太全面，只有几个方面拼在一块儿才能反映得比较全面。这是第一。第二，我



们虽然是他的孩子，但是我们了解的也不是十分多，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和我们在一块儿的，而是在干各种各样的事。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在不同的场合碰到曾经和他一起工作、生活、战斗过的人，他们经常和我们讲起各种各样关于父亲的小故事，体现我父亲好的品德的故事。我们将这些故事集中起来做了个整理。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些非常好的人物和传统，我父亲有幸也在这些人物行列之内，如果现在能够把他们的品德继承、发扬，是很重要的。同学们听完以后，如果能留下些印象，或者能记住些东西，我想，都是有益的。

首先，我讲讲父亲是如何“做学问”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父亲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而被大家认识的。科学家终身的目的是“探索未知，发展科学”，父亲就时时刻刻记住并确实实以“探索未知，发展科学”为己任。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就说过：要努力让科学在中国生根。30 年代，自然科学刚刚进入中国，父亲那时也刚学成归国。他本人在学术上全力以赴拼搏取得成就的时期，是在 20~30 年代到 40 年代初。父亲是在法国留学，处在物理学的最前沿。回国以后，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继续做研究工作。这近二十年的时间，是他全力以赴搞科研的时间，做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工作。1927 年到 1939 年共发表论文 53 篇，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科学杂志，所以这些论文有 40 篇左右发表在法国的杂志上，十几篇发表在英国和德国的杂志上。这些重要成果，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他另一方面的重大成就是把物理学传播到中国，在中国创建了物理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中国第一代有名的物理学家。直接和他工作过的，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七八位，培养了陆学善、钱临照、顾功叙、翁文波、吴学蔺、钱三强、杨承宗、王大珩、钟盛标、陈尚义等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因而，父亲被誉为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我不详细讲父亲具体的科学成就，那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我们虽然是他的孩子，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他具体的工作，因为

那时我们大部分还没出生，或者还很小。我生在1935年，父亲那时已经是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了。我们只能通过与他有过交往的各种各样的朋友聊天或看他的文章，来加深对父亲的了解。由于他做了那么多工作，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所以我可以讲一讲老父亲对科学研究，对做学问的一些主要想法，他到底宣传、重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对培养我们年轻同志能够很好地做学问的基本素质还是很重要的。首先，讲讲父亲晚年经常提到的怎么做科学研究的经验。他常讲这样两句话：“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两句话对于培养青年同志们努力拼搏的学习和工作作风，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1986年，父亲到浙江大学参观，校方介绍浙大的“求是”校风时，他说：“不仅要讲实事求是，还要讲好高骛远。”他说的“好高骛远”，指的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年轻人要把远大的抱负和踏实苦干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学问，日后才能有所成就。1993年我担任所长的电工研究所成立30周年庆祝会上，我父亲又给我们所写下了同样的两句话，并在大会上说，这两句话是他这个20世纪的同龄人在科技战线上工作了70年的一个重要体会。正如拿破仑说过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有敢于好高骛远，才有可能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而要真正攀登上去，又必须善于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坚韧不拔，无所畏惧。

父亲反复强调，科学研究的核心是创新。他在《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红旗》杂志1984年第一期）一文中，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心得，写道：“所谓创新，就是你最先解决了某个未知领域或事物中的难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人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别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而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两条，第一是能够提出问题，找到一个适合的研究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经过努力短期内能够解决，而不是那种经过10年、20年的努力都没有希望解决的；第二是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



能力”；“科学工作应该努力做成第一流的。怎样才称得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呢？首先，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等，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买来的”。这些思想，特别对现在的青年一代来讲，非常重要。中国科学在往前发展，现在我们的科技队伍已发展得相当大，但真正干一流工作，有创新思想的人还是太少，所以，同学们更得往这方面努力。父亲还说过：“作为科技工作者，必须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甚至要有所牺牲。”他热心宣传法国小说家莫泊桑难能可贵的话：“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力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法。”有一次吃饭时，胡适赞许父亲能在巴黎这样的繁华闹市里安心做学问，父亲回答说，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在一次会上，父亲发表了“对科技工作者不能分八小时内、八小时外，阿基米德就是在澡盆里发现其定律”的著名讲话。

父亲把尊重和捍卫科学视为从事科学的工作者的天职。父亲是位寡言的长者，但每当碰到这类事时，他是毫不含糊的。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他开完一个会后回来，很生气地谈到：“有人要开会批判法拉第电解定律。法拉第定律是经过大量实验验证过的，怎么能用开会来推翻呢？不相信可以到化学实验室再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拿出否定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当“特异功能”在进行各种宣传表演时，他发表的见解是：“科学的发展可能会发现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但发现者必须能教会别人去重复，大量重复得到相同的结果，才能成为科学。‘特异功能’只有少数人有，‘特异功能’者会，别人学不会。我笨，学不会还可以说，谁也学不会，就肯定不是科学，是魔术，骗人。”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吃饭，父亲在座，有一位较年轻的人在饭桌上鼓吹“特异功能”。父亲断然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同志答，是某大

学的副校长，父亲严厉地说了一句：“我看副校长应撤下来。”在这些问题上，父亲态度非常坚决，有特殊的敏感和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其次，我讲讲父亲如何“做事”？做事情的范围要比做学问的范围大得多。我父亲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做学问大概是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 20 年左右的时间。40 年代以后，他主要精力投入于做各种各样的事。他认为，搞科学是应该为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他对“知识”和“学问”两个概念也有独到的看法，认为“知识就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在学生时代的主要任务是获取知识，而有学问是指要会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以后的时间里，父亲做了些什么事情？抗战时期，他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至昆明，在坚持进行一些研究的同时，适应战时需要，带领全所员工制造出 1000 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的石英振荡器，300 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500 台 1400 倍的显微镜，200 架水平仪，50 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实际贡献。他一直牢记自己是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成员，积极参与他们的重大活动。抗日胜利后，由于经费奇缺，无法开展研究工作，父亲便集中精力编写《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和《初中理化课本》四部教科书。那些年代里，他从早到晚都在书桌上恭楷正书地写稿子，制插图，给我们树立了认真工作的榜样。这几部书教育了我国一代人，至今很多六七十岁的同志还常和我们说，他们在大学、中学时念的是严济慈物理。

全国解放使父亲欢欣鼓舞，年届半百的他热切期望继续在第一线为做出一流的研究工作而拼搏。这时，郭沫若院长亲自来看他，动员他参加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他清楚地知道：“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离开了他的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郭老当时劝他说：“倘因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父亲想通了，认为应该服从革命工